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

FAGUOERSHISHIJI WENXUECONGSHU

阴 谋



保尔·尼赞著 朱延生译

◎柳鸣九 主编

00136727

FAGUO
ERSHISHIJI
WENXUE
CONGSHU



阴谋

保尔·尼赞著 朱延生译

~~I14/256.7.6~~

F·20

丛书



290672512

阴师港
★

图书馆

I565.45/521

安徽文艺出版社

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

阴 谋

[法]保尔·尼赞 著 朱延生 译

责任编辑:江奇勇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6

印 张:9.625

字 数:150,000

版 次: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519-2/I·1411

定 价:11.6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本序：

法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文学的一部杰作

柳鸣九

《阴谋》发表于1938年，当年获联合文学奖。这表明了它是一部有价值的、令人瞩目的作品。如果人们要谈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话，那可不应该不想到这部书，因为，虽然获奖与否并不是衡量一部作品的绝对可靠、毫无疑义的标准，但获奖毕竟标志着更多人的认同与赞赏，而在法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中，获奖作品是寥寥无几，屈指可数的，尽管在左翼意识形态的范围里，有不少作品都被称为“杰作”。这里特别值得一提是，阿拉贡的妻子艾尔莎·特里奥莱的短篇小说集《第一个窟窿赔偿 200 法郎》，它作为抵抗文学的一部名作，于1944年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而被视为法国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代表作，又是出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主将阿拉贡手笔的六大卷的长篇小说《共产党人》，在法国却并没有获得任何文学荣耀。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前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现状、性质、作用与意义如何，不在我们作评的范围之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西方、在法国，则是我们在这里所应该涉及的。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今天，当人们论及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时，几乎极少再提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似乎它只是一场已经过去了的没有真实性的梦幻。

已经消逝了的东西，并非不曾存在过的东西。不要忘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法国曾经显赫一时。

按照一般的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界说，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总管日丹诺夫于1934年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来的，在法国，日丹诺夫的论述于1948年才译成法文。但是明确的理论概括与表述，往往是在实际的思想原则已经萌芽、形成以至确定之后才有的。社会主义对文学的实际的思想原则早在苏联革命阶段与革命胜利后就已经形成了，那就是文学要求必须从属于政治要求，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这种思想原则的确立与贯彻实施过程，在苏联是一部充满了响亮的口号、严厉的讨伐与痛苦呻吟的历史，在法国，情

况却颇为不一样。

在苏联革命的影响下,在第三国际的直接作用下,法国共产党于1921年宣告成立。从那时起,在法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得既充分又具有稳固性的西方大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却吸引了不少在资产阶级价值标准体系的范围里也获得了承认并备受尊敬、享有巨大声誉的作家。1921年,以人道主义精神、辉煌的文学成就与高贵风格而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法郎士参加了诞生还不到一个月的法国共产党;不久,又有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的文学家巴比塞于1923年参加了法共。在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四十年代,超现实主义、文学的主将之一阿拉贡过渡到共产主义,参加了党;龚古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名声日隆的杜阿梅尔在1927年之前明显左倾,曾一度成了红色苏联的朋友;1931年,曾以《约翰·克利斯朵夫》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罗曼·罗兰公开宣布站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队伍里来”“跟新生的力量一起战斗”;1934年,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将居重要地位的加缪入党;从1925年到1936年,法国文学中的巨擘式的人物纪德大幅度地向左转,公开赞同共产主义理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激烈批判者;龚古尔文学奖的又一获得者马尔罗在整个三四十年代,更是作为苏联与法共的同路人而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一番社会政治活动。第二次世

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共产党在地下抵抗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与斗争成效，更吸引了一些作家，著名诗人艾吕雅、著名小说家罗歇·瓦扬与著名女作家杜拉斯先后于1942年、1945年申请入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以上仅是以已经成名的作家而言，其他从事文化工作的一般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思潮的结合以及参加党，更是多见，其中一部分人后来又成为了知名作家，如瓦扬-古久里。总之，文学界名流与知识界精英的左倾与跟共产党的同路而行，可以说是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一个重大社会现象，一股明显而强大的潮流。直到五十年代中期匈牙利事件以后，情况才有了逆转。五十年代以后，随着法共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影响的日益下降，知名作家与知识精英支持赞同共产主义并参加共产党的现象再也难见了。

这不仅是法国二十世纪文化与文学的一段重要的历史，而且也是西欧国际共运发生、发展与衰落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对这一历史作出社会的、政治的分析与评论，不是笔者份内之事，也不是一件吃力易讨好的事，这里，笔者只想指出，在这样一个长期的政治左倾高潮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不可能不有一个难以抹杀的历史地位。

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构成这种文学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要素：一方

面在艺术方法上是传统的写实的方法，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则是明显的左倾与革命色彩。第一个方面比较单纯，第二个方面却往往比较复杂。政治思想上的左倾与革命化的程度往往是因人因作品而异，是大有差别的，如果加以区分，不妨说有以下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世界、对历史的总体认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观点的，对现实主义情势的描写是符合共产党对社会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论断的，对人物的态度、对事物的意趣，是符合无产阶级的价值标准、道德意识与审美观点的。这种高度的、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在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也许为数很多，但在法国却为数甚少，它只可能出自对共产主义信仰日久、在共产党里不仅作为有革命倾向的文化人、而且作为坚强的阶级斗士、甚至居于党的领导岗位、执行指挥任务的像阿拉贡这样的人物之手。即使对阿拉贡这样一个党中央委员来说，这也来之不易，他也是经过了多年“脱胎换骨”的痛苦过程与艰难的磨练，才窒息了他作为超现实主义诗人的生命而达到了“党赋与了我新的眼睛与记忆”的地步，在他达到对共产主义与对共产党的完全信从之后，他最明显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巨著就是六大卷的长

篇小说《共产党人》。

一种情况是较广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这种作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广义性，一是意味着它也许是产生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与原则正式提出以前，并非既定的文艺政策与创作纲领的直接产物，而只是同一个思潮范畴的文学现象；一是意味着它也许并非出自党内人士之手笔，而只是同路人与左倾人士所为；三是它并非全面完整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共产党的社会观点与政治主张，而只是部分地体现了这些意识形态内容。

先以罗曼·罗兰的《欣悦的灵魂》为例，罗曼·罗兰并非共产党人，而是共产党的坚定的战友，他的七大卷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问世于 1922 至 1933 年，先于日丹诺夫在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著名报告，但这部小说中关于知识分子应由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参加群众斗争的主题，反对法西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赞成无产阶级革命，拥护苏联的思想倾向，足以使它达到了符合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政治纲领的高度，因而，即使在法国也被左翼评论家认为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且不用说它在社会主义中国曾经得到过多高的评价了。不过，这部小说毕竟是出于罗曼·罗兰这样一个前期思想极为复杂的非党作家之手，其中柏格森的直觉论、生命力学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论与性

学说均在作品中有其痕迹。总之,可以说,这是一部政治上符合党的要求,而意识形态上尚未完全马克思主义化的作品。

马尔罗的《人的状况》情况也与此相近。首先,它也是1933年在日丹诺夫报告之前问世的作品,它以1927年中国大革命为题材,直接描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关键时刻的大裂变,即国民党与共产党由第一次合作到第一次分裂,以及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镇压。小说把当时中国复杂的政治关系,历史原委,激烈的现实斗争都浓缩在小说特定的时空框架中,在这里,中国的深重苦难、国共两党的深刻矛盾与分歧、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对立、外国金融资本势力与上海金融资本势力在革命危机面前的结盟、上海工人起义的轰轰烈烈、共产党上层领导与第三国际的左倾投降路线、蒋介石军队的残暴与血腥屠杀、起义者革命者的激昂慷慨、英勇壮烈,所有这些都是以清晰明确的线条与鲜明的色彩表现出来的。这样一幅历史图景,这样一种历史描述,即使是以中国国内党史教科书的叙述与观点来衡量,也是无可指责的。毫无疑问,就政治倾向而言,这部小说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是“合格的”,“达标的”,虽然马尔罗本人并非共产党人,而且他在小说里还表现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生存荒诞性与超越人命定性的马尔罗哲理。

第三种情况则姑且可称为“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这种作品的基本特点是：出自共产党人作家之手，但作品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没有体现党的社会政治观点与路线策略思想，也许只有某种轻淡的唯物史观与自然的阶级分析角度。在这种作品里，作者不是作为阶级的斗士、党组织的成员、信仰的宣教者、而只是在宣传主义、阐释信仰、表述党的形势观、社会观，以求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如果说这些作者还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他们最后都离开了共产党，其中特别著名的就有玛格丽特·杜拉斯与罗歇·瓦扬，前者于1945年参加法共，1955年离开法共；后者于1942年入党，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退党。两人在党期间，曾分别创作并发表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与《奇怪的游戏》、《美男子》、《325000 法朗》，他们这些作品的生活真实性都远远超过了思想意识的政治性，它们首先是栩栩如生、具有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品。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从来都有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划分，前者被视为党内坚定的左派、革命派，后者被视为党内的右派、消极妥协派、投降退却派。这种划分其实并不是以党内外为界限的，事实上，既有党内的布尔什维克，也有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至于孟什维克，似乎只存在于党内，如果到了党外，右派就不仅仅是孟

什维克了。从以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中的三种不同情况来看,第一种似乎可说是党内布尔什维克的作品,第二种似乎可说是党外布尔什维克的作品,而第三种则似乎可说是党内孟什维克的作品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标准尺度下,布尔什维克显然与孟什维克有天壤之别,即使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比党内的孟什维克身价也要高许多倍。但是,文化领域不是政治领域,不是党内路线斗争领域,文学领域有它自己的规律与价值标准、价值取向,任何真实描写生活的企图与努力,在这里总能得到良好的结果与回报,任何主观的宣教则往往适得其反,令人避而远之。至今,阿拉贡的《共产党人》、罗曼·罗兰的《欣悦的灵魂》在法国拥有的读者已经不多了,而杜拉斯与罗歇·瓦扬的小说却仍受读者的欢迎,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而其根本原因,恐怕也就在于文学本身的无情规律在起着作用。

保尔·尼赞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文化界,也要算是一个精英。他在巴黎两个最好的中学完成了学业,又考入了声誉卓绝的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与日后成为了左右两翼大思想家的萨特与雷蒙·阿蒙同班,毕业后,又考取了哲学教师资格,1927年他就参加了法国共产党,此后,在文学领域进行了卓越的活动,并创作了文学、历史、政治等方面的作品

多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0年在前线牺牲,年仅三十五岁。但是,在他战死之前一年,他反对斯大林与希特勒签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于该条约产生的一个月后宣布退党,他当即就被斥为叛徒,如果要给他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定位的话,他恐怕要算是一个党内的“孟什维克”了。他作为党内一个“孟什维克”的是非曲直与功过,是党史专家评定的问题,但对于其文学创作,我们却应当说,他的小说《阴谋》的确是一部成功佳作,足以使他名留后世。

《阴谋》以二十年代中期为时代背景,故事发生在巴黎的几个青年的大学生之中,他们不是巴黎高师的骄子,就是巴黎大学的英才,在思想上都是左倾者,向往革命,其中有的还加入了法共。这正是尼赞本人进入巴黎高师的年代,也是他投向革命,参加了共产党的时期。可以说,小说所写的正是尼赞那一代青年,正是他自己所属于的巴黎高等学校中那一批特定的青年,是他所熟悉的同学与同志,或许,其中有的人物的思想感情、面目身影或多或少有着他自己的基因与成份。

《阴谋》一书写于保尔·尼赞在党的时期,对于这样一种与自身事业有关、与自身经历有关的题材,保尔·尼赞既没有以与他本人的政治身份、思想、观点、意识形态有关的某种高昂的激情、严肃的理念,把它写成某种近乎红色回忆录的小说,也没有以个人追

昔的深情、缅怀的心绪，伤时的情愫，把它谱成自传性的柔情曲。他以冷峻的感情、严酷的态度、雄浑的笔力与真实的描绘，着力去表现出他那一代“指点江山”的青年，他那一批左倾同道的不成熟、自以为是、盲动、复杂、最后沦落失败的状态。小说中几个栩栩如生的青年形象，就是这一批人的代表。

这一批青年颇有理由以精英自命。毕业于名牌中学，又进入了著名学府。他们出口不凡，满脑子是形而上学的观念，思辨性思维方式与不乏精辟之处的见解，颇有青年思想家之风，至少是青年一代中的“思想家”。他们朦朦胧胧向往革命，带有一点叛逆性、不服从家长对自己前途的安排，从未怀疑过资产阶级的衰败与灭亡，蔑视与厌恶资产阶级家庭的规范。他们思想情绪不稳定，一时热衷于去发现新的哲学家，一时幽默情绪占上风，一时又无所事事，天天上电影院。他们崇尚否定精神，对什么都不相信，包括否定一切的无政府主义，他们没有什么主义信仰，在他们看来，斯宾诺沙、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列宁都不过是些“伟大的藉口”。他们颇有一点革命性、战斗性，但并不是为无产阶级而战斗，而只是“为自己而战”，他们要追求绝对的自由，不要进行任何选择，不论是选择女人还是选择政党，因为在他们看来，选择就意味着“固定”、“专一”，就意味着对自我的束缚，因此，他们不参加党，需要当“自由的射手”，

即使他们之中有人入了党，但纯出于个人的原因，而非出于对马列主义的信仰。至于共产主义，吸引他们的地方，与其说是未来，不如说是“非法的存在”、“躲藏的游戏”。他们也颇有科学精神，重视科学分析，并且想努力去戮穿与揭露当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神话、骗局与谎言，这倒的确是他们最可取之处。由于他们思想的幼稚不成熟与混乱，他们“想干出一番大事业”的行动方案，也就带有极大的盲动性与谬误性。先创办了一个刊物，倒还不失为有意义的作为，而后，又打算搞“阴谋”，决定用刺探军事情报的手段来反对当前社会，结果彻底失败，不了了之，成为了一个幼稚盲动的笑话。

同样，由于他们思想的不成熟，每个人的在现实社会中的生活道路也走得一塌糊涂。罗桑塔尔是这一批青年的“哲学家”，也是他们的组织者、领导者，但他实际上脆弱不堪，他与嫂子卡特琳娜的私通成为了本家的丑闻，而他偏偏要携安于资产阶级家族秩序的卡特琳娜私奔出走，正式结婚，并把“爱情上的成功”与否，视为“造反上的成功”与否。当他在家族所有成员，父母兄弟包括嫂子的“统一阵线”坚硬的墙壁上碰了回来时，他就万念俱灰，开枪自杀。罗桑塔尔的中学同学西蒙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他是罗桑塔尔的崇拜者、追随着，受命打入军队窃取军事情报，行事笨拙被人抓住，由于一种近乎荒诞的原

因而只受了点轻罚，很快就结束了自己的革命浪漫曲，而他的“革命行动”所获的军事情况，却一直被压在罗桑塔尔的抽屉里。普吕维纳热出身于普通家庭，不论从家境上还是从才华上，他都感到自己比罗桑塔尔等这几个富裕人家的子弟稍低一等。出于意气用事，争强好胜，他比这几个左倾青年更进了一步，参加了共产党，但因为太缺乏必要的思想基础，不久就沦为叛徒，出卖了党内的同志。在这一批青年中，最后只有拉福格在总结自己这一伙人的道路与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个“如何走出青年时代”的问题，他大病了一场，总算死里逃生，他感到自己的青年时代已经完结，他认识到“应该去选择”，“应该去寻找力度……牺牲不重要的东西”。他病后的这一感受，是否预示着他将开始一个成熟的阶段，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如何走出青年时代”，拉福格向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好，青年时代，充满了理想向往、青春活力与奋发有为的意志，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但青年时代，还残留着少年时代的朦胧、混沌、盲目、毛躁与幼稚。且看这批人如何审问叛徒，即可见其幼稚可笑的程度。因此，走出青年时代，摆脱青年时代这些也许是在所难免的缺陷，对于人生来说就是超越，就是胜利，不论是从事哪种事业的人都是如此，即使对于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是“特殊材料造

成”的革命家，也是如此，尼赞选择了这样一个主题，这是他小说深刻的所在，他围绕这个主题对一般人认为当然是正面人物的左倾青年进行了真实而不作任何美化、不加任何粉饰的描写，这是他小说成功的所在。整部小说是对一个年龄层次的一代人精神状态的思索、概括与展示，如果自己不是从这群人中走出来的，如果自己没有像青年主人公那样曾经有过精英式的英姿勃发与孩童式的踉踉跄跄，是不可能写得如此真实生动的。

《阴谋》是一部具有巨大历史真实感的书，作者很注意对真实的历史背景作出明确的展示，他所交待的社会政治事件都是真实而具体的，这就使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法国二十年代中期的日程纪实，是某些历史场景的宝贵的画面，如 1924 年让·若雷斯的遗体移葬先贤祠的场面就写得极为出色。而作者对社会历史事件的描述与人物在集会中、在信件里、在餐桌上对时局动态的评议，则带有某种政治的性质。

对社会历史描写的真实性与对青年问题理解的深刻性，是《阴谋》的主要价值，这是我把它视为法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为数不太多的一部杰作的原因。

1995 年 8 月 20 日